



万历官修本朝 正史研究

李小林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万历官修本朝正史研究

李小林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万历官修本朝正史研究

李小林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天津八里台南开大学校内)

邮编 300071 电话 2350854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南开大学印刷厂印刷

1999年4月第1版

1999年4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625

字数:365千

印数:1-1000

ISBN 7-310-01247-X

K·89 定价:18.00元

自序

所谓官修本朝正史,指的是由政府组织纂修本朝纪传体史书的活动。如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富有修史传统的国家。早在周代,就已经确立了史官制度。此后,尽管史官的名称屡有更改,但修史活动却一直沿续不辍。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仍然沿用历代旧制,设立翰林院,置史官掌修国史。在明朝纂修本朝史活动中,万历年间进行的一次规模较大的由内阁大学士、礼部尚书陈于陞建议发起的官修纪传体本朝史活动,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次活动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对后世编纂有关明代历史的史书发生了重要的影响,现在存世的这次修史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尚有不下九种之多。但是,由于这次修史活动是半途而废的,因此在已往有关明代史研究的论著中,基本上是只被约略提及,还没有作出应有的详细考察。对于这次修史活动论列较早的是吴晗先生,他在1940年脱稿的《记明实录》一文中曾顺便提及这次修史活动,但只是引录了《明史》“陈于陞传”及“王穉登传”、朱国禎《湧幢小品》、谈迁《枣林杂俎》、孙承泽《春明梦余录》等书中的五段记载,其在各段记载之间虽加有几十字的论述语句,但主要起连缀作用,明显的矛盾之处也没有进行辨证,而且其论断也有失误。^①盖作者的用力之处不在这次修史活动,其注意力几乎全在“明实录”上,所以才致如此疏略。不过,其较早地论及这次修史活动的功劳是不可没的。而后于1941年又有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一书,在其第六章“唐宋

① 吴晗《读书琐记》第167—16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以来设馆修史之始末”中,再次提及这次修史活动。这次提及更为简略,包括这段文字的史料出处注文在内,一共不过一百另六字。^①及至八十年代中期出版的黄云眉《明史考证》一书,虽然将陈于陞主持的官修国史活动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不过只是比吴晗先生对这次修史活动的记述多增录了《明经世文编》中所载的陈于陞关于请求进行这次修史活动的上疏,且在其数量甚少的论断中,同样因没看到更多的资料而有误。^②以上是关于这次修史活动总体情况的研究成果。此外,还有一些论著对这次修史活动的成果之一焦竑《国史经籍志》进行了研究,其中主要的是1934年出版的汪辟疆《目录学研究》一书,在其“论唐宋元明四朝之目录”一节中,用近一千字的篇幅介绍了焦竑《国史经籍志》的类型、内容以及清人对其绝然对立的两种评价,并对其优缺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③汪辟疆所述的文字,持论稳妥,令人首肯,只是篇幅太短,论述未能展开。总观既往有关陈于陞主持的撰修本朝纪传体史书活动的研究,可说是虽有成绩,但基本上处于甚为缺乏的水平之上,有关资料基本上尚未发掘利用,修史活动的总体状况基本上尚未弄清,对其现存成果更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如这次修史活动的重要成果之一焦竑《国朝献征录》,虽在学术界被广泛征引,但迄今未有一篇论述其书的论文。其所收人物的时间下限为万历年间,但1986年上海书店影印该书之时所写的“说明”,竟将之误记为嘉靖年间)。这无论从推进明代史学史研究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有利于发掘研究明史资料的角度着想,都是应该及早补上的一课。

笔者鉴于上述研究状况,自1986年对陈于陞主持的官修本朝纪传体史书的活动开始进行研究,于1989年完成了以《万历年间

①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113页,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② 黄云眉《明史考证》第6册第1746—1748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③ 汪辟疆《目录学研究》第55—57页,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

陈于陞主修“国史”述略》为题的硕士论文。该文在广泛收集研究有关资料的基础上,不仅对这次修史活动的过程、编纂人员的组成以及他们的分工、取得的成果作了详尽的叙述,而且对这次修史活动半途而废的原因也进行深入的探讨,补充了前人的论断。该文分两篇刊出,一篇题为《关于万历年间陈于陞主修“国史”的几个问题》,刊于《南开史学》1990年第2期;一篇题为《明万历年间的撰修“国史”活动》,刊于《南开学报》1991年第6期。此后,笔者在读书的过程中,又惊喜地发现了数量颇多目前尚存于世但鲜为人知的这次修史活动所取得的成果。于是结合博士论文的撰写,对这些成果进行了详细研究,本书是笔者进行上述研究的最后成果,也是笔者提交的博士论文的进一步加工。全书分研究篇和史料篇。

在研究篇分三章十四节对这次修史活动作了系统、详细研究。

在第一章,用五节的篇幅对这次修史活动的过程作了详细介绍。这次修史活动的主持人陈于陞在万历二十一年九月四日的上疏中,不仅提出了编写纪传体本朝史的要求,而且充分论证了及时进行此项工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对编写的具体计划也作了设想。正是有这样一位好的主持人,又有一支数量多、质量高的写作队伍,使这次修史活动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这次修史活动坚持的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原则反映和发展了嘉靖以后史学界出现的求实新潮,使这一新潮由私修活动扩展到官修活动之中。然而,这次修史活动因种种原因而中辍,在明代史学史乃至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回顾陈于陞主持的修史活动,它能集中相当庞大的高质量的写作队伍,能在两、三年中取得丰硕而难得的成果,这无疑显示了官修史书的优越性。但在它开展过程中,写作的指导思想和写作口径,受到官府的严格控制,一些本应合理解决的问题却不能得到解决(如建文帝立专纪的问题),其能否顺利进行,也受到当权者意志的严重干扰,甚至因此而使之半途而废了。这些又说明了官修史书的局限性。应该怎

样正确评价封建社会的官修史书？这当是陈于陞主持官修本朝史书一事留给后人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第二章，用五节的篇幅分别对笔者发现的这次修史活动的现存成果即焦竑《国史经籍志》、《国朝献征录》（以上两种，已为史学界熟知）、史继偕《皇明兵制考》、吴道南《国史河渠志》、杨继礼《皇明后纪妃嫔传》、陈懿典《七太子传》、《庙祔十五王传》和《汉庶人传》等八种书，从史料来源、内容体例的优缺点、版本源流诸方面，进行深入的考察，笔者认为这些成果都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内容丰富，对之进行探讨将有利于明史研究的深入。

在第三章，用四节的篇幅详细论述了这次修史活动对后世史学产生的影响。谈迁《国榷》、傅维麟《明书》、查继佐《罪惟录》、王鸿绪《明史稿》以及清朝官修《明史》等等在史学史上具有很高地位的著作，在写作过程中都将这次修史活动所撰写出的史书当作重要的参考和借鉴，甚至有不少卷篇袭用了这些史书的原文。事实说明，陈于陞主持的这次修史活动，不仅在明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也占有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

在史料篇中，即附录现存于世但鲜为人知、流传不广、不易找到的这次修史活动的部分成果。即史继偕的《皇明兵制考》，吴道南的《国史河渠志》，杨继礼的《皇明后纪妃嫔传》，陈懿典的《庙祔十五王传》、《七太子传》和《汉庶人传》，目的是将之介绍给广大读者，以资利用。至于流传较广、利用方便的这次修史活动的其他现存成果，为压缩本书篇幅，即略而不收了，请读者见谅。

李小林

1997年10月

附注：在本书排印过程中，发现钱茂伟先生在《宁波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发表了《万历中叶正史撰修探赜》一文，该文探索了这次修史活动的失败原因及其影响。惜直至今日笔者尚未见到原文。特此附注。

（1998年1月15日）

目 录

自 序	(1)
-----	-------

研 究 篇

第一章 万历官修本朝正史之概略	(3)
第一节 适时的建议	(3)
第二节 成竹在胸——高明的编写计划	(9)
第三节 数量多、质量高的写作队伍	(12)
第四节 丰硕的成绩	(25)
第五节 半途而废及其后事	(34)
第二章 尚存人间的成果	(41)
第一节 《国史经籍志》和《国朝献征录》	(42)
第二节 史继偕及其《皇明兵制考》	(51)
第三节 吴道南及其《国史河渠志》	(68)
第四节 杨继礼及其《皇明后纪妃嫔传》	(102)
第五节 陈懿典及其所撰三种明人传记	(141)
第三章 对后世史学的影响	(171)
第一节 史继偕《皇明兵制考》对后世史书的影响	(171)
第二节 吴道南《国史河渠志》对后世史书的影响	(182)
第三节 杨继礼《皇明后纪妃嫔传》对后世史书的影响	(212)
第四节 其他成果对后世史书的影响	(219)
结 语	(221)

史 料 篇

《皇明兵制考》	史继偕撰(225)
---------	-----------

卷上 序 京营 江防 四卫营 侍卫上直官军
 (大汉将军) 皇城守卫 京城巡捕 班军
 卷中 大阅 亲征 奏捷 功赏
 卷下 选用将材 征调 军器火器 战车 战船
 十三省设兵(缺) 乡兵夷兵 郡县民兵 后
 论(赞曰)

《河渠志》…………… 吴道南撰(302)

序 运河 黄河 通惠河 沁河 卫河 白河 济
 河 淮河 汶河 沂河 泗河 洸河 卢沟河
 桑干河 津沱河 蓟州河 昌平河 密云河 天津
 海口新河 诸湖 诸泉 闸坝 海运 郡国水利

《皇明后纪妃嫔传》…………… 杨继礼撰(396)

高皇后纪 文皇后纪 昭皇后纪 章皇后胡氏纪
 章皇后孙氏纪 睿皇后纪 孝肃皇后纪 景皇后汪
 氏纪(杭氏附) 纯皇后纪(废后吴氏附见) 纪皇后
 纪 孝惠皇太后纪 敬皇后纪 献皇后蒋氏纪 毅
 皇后纪 肃皇后陈氏纪(废后张氏附) 孝烈皇后纪
 孝恪皇后纪 高庙宁妃郭氏 贵妃孙氏 文庙贤
 妃权氏 贵妃王氏 宣庙郭嫔 贵妃唐氏 宪庙贵
 妃万氏 世庙贵妃王氏 端妃曹氏

《庙祔十五王传》…………… 陈懿典撰(426)

《七太子传》…………… 陈懿典撰(428)

懿文太子标 太子文奎 怀献太子见济 悼恭太子
 祐极 哀冲太子载基 庄敬太子载坚 宪怀太子
 翊代

《汉庶人传》…………… 陈懿典撰(442)

主要参考书目…………… (449)

后 记…………… (457)

研 究 篇

第一章

万历官修本朝正史活动之概略

第一节 适时的建议

陈于陛(1545—1596),字元忠,号玉垒,四川南充人。隆庆二年进士。历任编修、礼部尚书等职。后任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不久改为文渊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著有《万卷楼稿》和《意见》。他在万历二十一年九月四日,正式上疏提出编纂纪传体本朝史。^①这是及时的适应客观需要的一个建议。

明朝自1368年朱元璋建都南京,至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陈于陛上疏建议纂修纪传体本朝史,朱明王朝的统治已经经历了二百二十五年。在这长达二百多年的时间里,明朝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如经济上,由于明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大一统时期,加之明初以朱元璋为首的统治集团实行了许多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因此,生产力水平比以前进一步提高,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商品交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并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政治上,明朝统治者总结和吸收了中国历代封建统治的经验教训,

^① 《神宗实录》卷264。

对地方到中央的行政机构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加强皇权的改革,使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种变化,一方面加强了对劳动人民的控制和压迫,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发展。总之,到陈于陞提出编纂纪传体本朝史之时,明朝经过二百余年的发展,已积累了许许多多的历史内容。为了便于后人的研究和借鉴,对这些历史内容十分需要加以系统、详细的记载,这是客观实际提出的要求。

在陈于陞之前,明朝并非没有记载本朝历史的著作。中国是富有修史传统的国家,历代统治者都非常注意修史,明朝自然不能例外。自建国起明朝就有官修本朝史的活动,为了修史还设有史官之职,其史官最初“重文学,不拘资格”,“宣德后,专以修撰、编修、检讨为史官”。^①除了官修之外,还有私人修本朝史书者。南宋时曾禁“私史”,明朝“不明许人著”本朝史书,但也无明文禁令。^②因此,私修本朝史者甚多,特别是进入明中叶之后更多。由于既有官修,又有私撰,所以到陈于陞提出编纂纪传体本朝史时,早已有许多关于本朝历史的书籍问世了。如果根据《明史·艺文志》二“史类”,将完成于万历二十一年以前的官修与私撰本朝史书加以统计,可以列出下面的表格:

万历二十一年以前官、私修本朝史书一览表

类别	官修或私修	数 量	合 计
正史类	敕 修	14	29
	私 修	15	
杂史类	私 修	10 记洪武时期	96

① 《明会要》卷36。

② 朱国祯《湧幢小品》卷下“班史”。

类别	官修或私修	数 量	合 计
杂史类	私 修	6 记建文时期	96
	私 修	9 记永乐、洪熙、宣德时期	
	私 修	8 记正统、景泰、天顺时期	
	私 修	20 记成化、弘治、正德时期	
	私 修	28 记嘉靖、隆庆时间	
	敕 修	3 记嘉靖、隆庆时期	
	私 修	12 统记有明一代事	
故事类	御 制	9	32
	敕 修	9	
	私 修	14	
职官类	敕 修	1	24
	私 修	23	
仪注类	御 制	4	9
	敕 修	4	
	私 修	1	
刑法类	御 制	10	18
	敕 修	1	
	私 修	7	
传记类	私 修	16	16

类别	官修或私修	数 量	合 计
合计	官修、私修		224

上表也只是一个粗略的统计,很不完全,这是因为:第一,《明史·艺文志》二“史类”共分十类,本表只收了表中所列的七类,其它三类即史钞、地理、谱牒所载的万历二十一年以前问世的有关本朝史著作,如陆深的《停骖录》、费信的《星槎胜览》、马欢的《瀛涯胜览》、田汝成的《炎徼纪闻》和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等书因都在地理类,故未被统计在表中。第二,《明史·艺文志》二“史类”所收的书也并不完全。如李默的《孤树哀谈》、徐祯卿的《翦胜野闻》等书并未著录,实际上这些书在万历二十一年陈于陞上疏前就已问世。上表所统计者尽管并不完全,而其总数已为 224 部,这充分说明了当时所撰出的本朝史书数量之多。

既然万历二十一年以前已经撰写出了大量的本朝史著作,那么对于万历二十一年以前的明朝二百多年的历史,就似乎不再需要另写新书了。在这种情况下,陈于陞提出了上述建议,岂不是非常不必要的吗?怎么能说是及时的、适应客观需要的建议呢?回答这个疑问的关键在于,要看一看万历二十一年以前已经撰写出来的官、私修本朝史著,是否可以为人们研究明朝万历前的二百多年历史,提供较好的根据。按之当时的实际,对这些史书的这一功能的回答只能是否定的。

首先从官修史书来看。当时官修的有关史书,其质量高,作用最大者是历朝实录。这些实录虽然内容相当丰富,但缺乏系统整理,事件首尾,人物本末等等皆不能备。另外,由于受政治气候和秉笔者态度的影响,歪曲事实之处,屡见不鲜。这一点已为历来史家多次批评。为了节省篇幅,这里不必多赘。实录的这种状况,怎么能使之算作研究万历前的二百多年历史的详细、系统、理想的史

书呢？实录这一质量最高的官修史书既然如此，其他官修史书就更可想而知了。

其次从私撰史书看。当时的私撰史书，有的因缺乏史学修养，“轻听而多舛”，或“好怪而多诞”，有的因作者居心不妥，“挟郅而多诬”。^①这样的史书显然也不能算作详细、系统、理想的著作。

嘉靖以后，面对官、私修史书质量不高的状况，已有部分态度严肃的史家出面进行批评，并力图加以纠正、写出了高质量的好史书来。郑晓和王世贞就是这样两位史家。郑晓曾撰《今言》一书，其中对有关本朝史的官、私修著作中许多谬误之处作了考订。王世贞曾撰《史乘考误》十一卷，^②对有关本朝史的官、私修史书也作了大量的纠误工作。但是，由于他们作为一个野史著作家，受到人力物力的限制，加之前人为其所作准备工作也不充分，所以他们并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写出一部十分理想的本朝史来。如郑晓曾写《吾学编》一书，这是一部经过严格考订、内容相当可靠的史书，但篇幅不大，明朝人曾评论它“实而未详”，^③这便使其价值大打折扣。

万历二十一年以前已撰写出的有关本朝历史的官、私史书，皆不是系统的、详细的、十分理想的著作，这就使陈于陞的建议，不能不说是十分必要的了。

陈于陞的修史建议不仅是适应客观需要的，而且从资料方面讲，是完全有条件实现的。在此以前编写出的官、私史书若就史学编纂的最终产品讲，都不是高质量的，但它们若从提供某一方面的编史资料的角度讲，又都是有一定价值的，并且由于它们数量极多，倘将之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就可说是为写一部系统、详细、高质

①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20“史乘考误”。

②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本。

③ 《国朝献征录》黄汝亨序。

量的史书提供了足够的资料。关于此,陈于陛在建议修史的奏疏中就给予了充分的注意,他说:

实录有圣德之总叙,宝训皆列圣之渊猷,此外有御制文集,有《圣政记》,有《皇明诏制》,及诸臣所编如《大政记》、《昭代典则》、《孤树哀谈》、《宪章录》、《鸿猷录》之类,参以《三朝圣谕录》、《前后北征录》、《天顺日录》、《燕对》、《宣召》、《视草》、《宸章》等录,更加采辑藻润,即可以为列圣大纪。

帝系宗谱有玉牒,公侯绍封有兵曹底簿、《封爵考》,参以《吾学编》“同姓”、“异姓”、“王侯”、“内阁”、《典铨》表及《列卿表》之类,更加考订增益,即可以为累朝年表。

制书如《一统志》、《官制》、《大明令律例》、《大明集礼》、《洪武礼制》、《明伦大典》之类;诸司列布者如《宗藩》、《军政》、《会计录》、《太仓考》、《漕河图志》、《海运编》、《太学》、《马政》、《盐法》志之类;四方形势如《广舆图》、《九边图说》、《星槎胜览》、《瀛涯胜览》、《炎微纪闻》、《殊域周咨录》之类,折衷以“实录”、“会典”所纪载,参以《衍义补》、《名臣经济录》,疏议诸书,《吾学编》中“天文”、“地理”、“三礼”、“百官”、“四夷”、“北虏”诸考述,即可以为国家诸大志。

实录中有后妃事迹,廷臣自三品以上有小传,益以开国、靖难功臣录、《群志备遗录》、《名臣言行录》、《名臣纪》、《殿阁词林记》、《琬琰录》、《今献备遗》之类,其诸高逸学节等目,更采摭于郡国志,即可以为国史之列传。^①

编写史书时,除了文献资料之外,口碑资料也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编写本朝史时,口耳相传的口碑资料是文献资料的重要补充,有时某些口碑资料正是保存于事件的当事人心中,其价值就弥

① 《明经世文编》卷426,参见张萱《西园闻见录》卷29“史局”、《神宗实录》卷264。